

立德树人的徐大同先生



刘训练

徐大同先生所著文集及主编的部分专著



不久前,欣闻恩师徐大同先生的塑像即将在天津师范大学校园落成,今年又恰逢先生95岁冥诞。我回想起在先生身边亲承教诲十九载的历历往事和点点滴滴,不禁思绪万千,感慨系之。

在本科读书期间,我就对西方政治思想史这门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在报考研究生时,我对国内政治学界的相关情况作了充分的了解。之所以最后选择了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学理论专业,就是因为这里有徐大同先生坐镇。入学前,我便熟读先生主编的教材和撰写的文章,因此,我是带着对先生的崇敬来到师大求学的。

徐大同先生1928年9月出生于天津,1949年1月参加革命,进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学习和工作;1950年起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国政系任教;1973年转入北京大学国政系任教。

虽然先生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法学说的第一批宣讲者,但他学术生命力的勃发却在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他从北京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当时叫天津师范学院),此后便积极投身于我国政治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工作。1982年是先生学术生涯中最为繁忙而重要的一年:4月至5月,他受邀为中国政治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委托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举办的“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4月至6月,受教育部委托,他在天津师范学院主持了全国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7月,他主持编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列入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规划(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出版)。

此后,先生带着团队长期耕耘在西方政治思想史、当代西方政治思潮以及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领域,推出了一部又一部在当时国内具有开创性和领先性的著作、教材与工具书。同时,他还致力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繁荣,曾长期担任学会的常务理事、副会长、顾问,并长期担任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天津市政治学会会长、天津市法学会副会长等职务。

可以说,先生是新时期我国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也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天津师范大学政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治学学科成为国内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镇。

我在先生身边受教近二十年,硕士毕业后留校后期担任先生的学术助手,又加上我住得离先生寓所很近,常到先生家里帮着处理一些杂务琐事,所以我在方方面面都对先生有深入的了解,同时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又在方方面面得到了先生的关照。

如果要用几句话来总结先生的一生的话,我想或许可以这么来概括先生的理想信念、治学从教与为人处世。

首先,先生在政治上是追求进步的,在信仰上是坚定的。先生的一生经历和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到奋进崛起。正因为如此,他从参加革命之日起便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将实现共产主义视为不渝之志,也为此而奋斗终身。

先生生前曾多次向我讲述过他人党的事情。先生在青年时代,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一直没有入党;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是一直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1985年,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有人提示先生,他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无党派人士身份;一旦入了党,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连任了。先生对此置之一笑,他说,入党是我的夙愿,是我的政治生命;而政治生命是高于政治荣誉的。

其次,先生在治学与业务方面不断进取,追求卓越。先生一直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不仅是他的自谦,也是他的自勉。先生从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总是把目光投向下一个任务。由此,他带领团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即便到了耄耋之年,先生也仍然笔耕不辍。他曾多次向我提及希望修订他早年主持编写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直到后来他完成了内容和体量更为简约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学》,才算了却心愿。而在他人生的最后的那段时期,先生还在指导和牵挂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二版)的修订和出版工作。正如他在临终前不久向探望他的学校领导所吟唱的,“为国家哪曾半日闲空……”。

最后,先生对学生在学术上是严格要求的,在生活上则是关爱照顾的。作为立德树人的“大先生”,先生形成了一套“教学问、教做人”的教育理念。在“教学问”上,一方面先生始终向我们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为中国研究西方,要有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先生在学术上又是与时俱进、开明的,从不干涉我们的具体选题和论点。每当

他对我们的某个观点、见解有疑问或不同看法时,他总是能够一针见血地点出症结所在,对于我们的含糊其辞,他从不轻易放过,总是追问到底,直到把问题澄清;但只要我们能够给出合理的解释,先生又从不固执自己的看法,绝不强加于人。

在生活上,先生对学生则是一视同仁地关爱。每逢节日,他总要招呼一些没有回家的学生去他寓所聚餐,让大家感受过节的氛围。许多同门都将先生视为良师益友,即便在毕业多年以后也都愿意向他倾诉工作和生活中的困惑。

自2000年投入先生门下,我便在学业、生活等方面得到先生的悉心教导与尽心帮助。

秉持“三教”理念,先生对学生的教导不仅体现在课堂上,也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提点上。念研究生阶段,我曾多次陪同先生赴吉林大学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在行程间隙的聊天中,先生总是据他观察到的我的言谈举止,结合人情事理给予细致的点评,每每如此,让我这个从前只知道埋头读书的懵懂学子开始慢慢领悟人情世故。

硕士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对自己的未来(就业还是继续深造,在哪里深造)有过踌躇,先生对此多少有些觉察,但他并未向我挑剔,而是希望我自己作出选择。种种原因使然,我决定继续留在师大攻读博士学位。记得有一次在与先生的闲聊中,我不经意地提到自己的这一意愿,先生马上说了一句,那就留下吧。虽然先生说得淡然,但我还是深切感受到了先生的喜悦。

学生时代还有一件事更是让我永志不忘。那是2003年毕业季,也是“非典”肆虐的日子,我忽然患上病毒性感冒,连续好几天高烧不退。在隔离的状态中,先生每日给我打数通电话(那时手机还不流行)询问病情,纾解我近乎孤立无援的精神压力,让我挺过了那段难熬的时日。诸如此类生活上的细心照顾,先生的很多学生都有自己的回忆,并非对我的特殊厚爱;所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正是如此吧。

在学业上,先生也是知人善任,因材施教。记得我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时,曾担心自己硕士期间主攻的课题过于“时髦”而打算放弃,先生得知后主动找我谈话,认为我在此课题上已经有积累,支持我继续沿着先前的方向推进,使我打消了顾虑。先生的开明、宽和与通达,我曾听学界的多位前辈和同门谈及,此后更是切身感受,这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

留校任教后,我有幸继续得到先生的亲炙。除了作为先生的助手,在学术上向他请益之外,每当我在业务上或生活中遇到困难、挫折时,我都会去找先生聊一聊,而先生总是会从各方面对我进行开导,给予建议和帮助。这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独特体验,并让我受益终身。在我自己成了教师和导师之后,先生自然成为我的垂范,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虽然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四年多了,但他生前的愿望如今都在逐步实现。不管是他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三教”教风,还是他在治学方面提出的“为中国研究西方”的教导,以及他始终坚持的“从头越”精神,都在天津师大政治学的学科建设中得到继承和发扬。正是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之下,师大政治学人胸怀天下、守正创新,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而这也是对先生最好的告慰!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

【学人小传】

徐大同(1928—2019),我国著名政治学家、法学家,生前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思想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主编或合作完成专著、教材和工具书近20部,发表论文50余篇,代表性作品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主要作者)、《西方政治思想史》(主编,多个版本)、《中西传统政治文化比较研究》(主编)、《五卷本西方政治思想史》(主编)、《文综史迹》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讲学》等。

宛若扇页,清扬含蓄,逸然可人。世上没有哪种树像它那样,枝干与叶片混搭得如此大胆,如此绝对,如此协调,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深秋,捧起满眼的金黄,晾晒整理装成枕袋。据察,银杏叶制成之枕,淡淡幽香,能改善人体呼吸,提高睡眠质量。余不以为然,倒觉得将其制成书签,极为实用,浅浅书香,弱弱儒生,黑白相间中透股清澄,温润心脾,令人浮想联翩。

傍晚,四周洋溢着宽厚粗重的怀旧气息,悠悠的橙黄于斑驳中升起,更加映衬出它的经典。推却白昼,卷起帘幕,薄暮清透如烟,无量雅致,一抹沧桑,绚美得让人心醉。淌着轻轻的墨染,我要把银的月亮嵌镶在金的扇面之间。

银杏树

刘松林



草庐陋窗旁,前年移栽了两株参天的银杏,树干挺直苍苍,枝繁叶茂向上。夏日郁郁葱葱,扑面清新,蔽日遮风;秋来金黄可掬,雍容华贵,俊朗雄踞。

银杏树给人的感觉是高挑挺拔,气宇轩昂。枝干伸得奇异,思维果敢,行云流畅,让人震撼;叶子展得文雅,

天津市河北区民主道有一座幽静的小院。小院中现有前后独立的两幢小楼,临街小楼前立着一座半身铜像,下书几个秀丽的楷体大字“曹禺故居纪念馆”。这里不是曹禺出生的地方。在回田本相先生的访谈中,曹禺说过:“我出生在天津小白楼,是平房,哪个胡同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住在一个胡同口上。”曹禺7岁时,父亲万德尊用多年的积蓄买了房产,距离天津东站很近,位于“意租界二马路28号”,就是现在的曹禺故居。直至转学去清华大学之前,曹禺都生活在这里。如近代天津是戏剧大师曹禺诞生的地方,曹禺正是从这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

曹禺成为剧作家,得益于近代天津文化环境的熏陶。近代以来,天津戏曲、曲艺发达,各种传统的舞台艺术品类繁多。曹禺的继母爱看戏,耳濡目染下,他逐渐对戏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时候看了不少京剧,求学期间也偶尔上台表演;还看昆曲、听大鼓等,从旧戏中学习了不少描写人物性格的技巧。天津开埠之后,西风东渐,文明戏盛行,曹禺又看了不少文明戏,从中体会到戏剧对观众的感染力。丰富浩瀚的曲艺种类,既在曹禺身上播下了戏剧艺术的种子,又开阔了他的艺术视野,为他从事戏剧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借鉴资源。

近代天津的新剧运动为剧作家曹禺的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曹禺曾说过,“我很感谢南开新剧团,我一生最后坚决搞戏,就是南开新剧团培养起来的兴趣和信心”。南开学校是现代话剧演出的中心,“创办以来,一直在学业之余,为改进社会风气,也为教育自己,演普通话的戏。老师和学生编话剧,导话剧,演话剧,并且公开举行演出,受到津京观众热烈欢迎。”对戏曲本身就有兴趣的曹禺就读南开学校,可谓如鱼得水。他15岁进入南开新剧团,拜留美留学的张彭春为师,和他一起改编剧本,并多次在剧团演出的中外名剧中扮演重要角色。舞台实践使曹禺熟悉舞台、熟悉观众,熟悉如何写戏才能抓住观众。他创作时会考虑舞台表演、剧本审美、观众接受诸方面的综合效果,所以其作品一问世即不胫而走,获得业内外的一致认可。

近代天津处于北京政治舞台的幕后,是一个商业发达的现代大都市,丰富多元的社会环境为曹禺提供了纷繁复杂的生

时光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曾有过屈辱的百年。曾几何时,“衣冠王国”似乎有些遥远,西装领带仿佛才是文明的体现。

如今,中国人不仅站起来,富起来,而且强大起来。我们秉承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平等地看待各国文化,不再认为西装是先进的代表,客观地说那只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快速发展的智能时代,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服装都显示着丰富且厚重的文化积淀。抛却具体款式与质材,就服装文化而言,没有高低之分,没有陈旧与前沿。

早在公元前2900年至前2700年间,埃及第一、第二两代王朝时,被公认为尼罗河流域第一人的纳尔莫就成功统一了上下埃及。他身穿身穿显赫的灰色铠甲,铠甲关节板上有一个圆形凹陷,上面涂抹了不同颜色。仅腰间就有四条念珠连成的下垂装饰,每条垂饰上端有一个带角的人头,这是埃及女神海瑟的象征。腰部侧方垂吊一条雄狮尾巴,拖至脚踝,它标志着该着装者具有杰出的才能和本领。我们能说这些服饰在现代看来太过落后了吗?能够认为那是发达的标志吗?要知道,五千年前的埃及服饰工艺水平是相当高超、无与伦比的。

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诞生了两河流域的文化艺术,出土于约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的“皇家陵园”珠宝,简直令人叹为观止。伊拉克南部乌鲁克曾有1840多座墓葬被发掘,其中一座大殉葬坑出土的殉人和随葬品数量惊人,因此被称为“皇家陵园”。在这里出土的饰品,有的项链上悬挂着用珠子间隔开的金环,有的穿着三角形的金片和树叶形的金挂件。它们都用不同形状和质地的石珠交替穿在一起。另外还有巨大的船形金耳饰,由于阿富汗西北部的巴达赫尚有天然青金石,印度西海岸的坎贝湾有深橘红色玛瑙,因而这些饰品上常镶嵌亮丽或具有浓重色彩的宝石。如果我们今天将当年的佩饰穿挂在自己身上,丝毫也看不出历史的痕迹,反而会被认为是最新式样的奢侈品。时尚总是轮回的,怎么分出来新与旧呢?

中国可谓衣冠大国,早在公元前1046年建立的周王朝就已经建立了完整的服装制度。正式史书有“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共有25部,其中10部史书中设立了专门的“舆服志”,即记载了车马仪仗等礼仪规定。儒家经典“三礼”,其中《周礼》《仪礼》大篇幅论及服装,《礼记》更有单独一篇“深衣”。《战国策》《左传》《史记》等都有诠释古代礼制的内容,保存了很多有关服饰规格、风尚的史料。春秋末齐国人记录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专著,“百工之事”的各类叙述中自然涉及缁丝、染色、皮革等制作细节。哲学著作《春秋繁露》《淮南子》,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多能鄙事》,训诂书《尔雅》《广雅》《说文解字》等,均包含服饰。其他语言笔记类《急就篇》《古今注》《西阳杂俎》《梦溪笔谈》《东京梦华录》……数不胜数,可见中国服装文化有多么深远、高博、伟大!也许,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得机械、道路设置等都带着看得见角度的工业味儿,一时使人感到阔衣大袖和繁缛饰品难以与之相称,因此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非工业文明的服装根本无法在现代生存了。可是,谁都没有想到,世界多元了,尤其是智能时代的到来,大家都坐在平板电脑前,已看不出谁的服装更便捷。

这时候,人类社会信息互通,大家方有感悟,很多国家很多民族的服装相当美,其内涵也相当深奥,西式服装并非一家独大。先说中华民族56个兄弟民族的文化多姿多彩,那数不清的服装样式令人赞叹,再放眼亚洲范围,东南亚人的传统服装,男子多有布质“包头”或“缠头”,尽管称谓不一;女子的头上则插戴饰品,或是以布质头巾与辫发扎系在一起,很多都与传统文化有关。男女的上衣多无领,有对襟或大襟;下装男有裤、裙两种,女子多为裙。男裙一般只在正面用结子束用,女裙则在侧面束住。对于这种长及膝下的一男子短裙,称呼并不完全一样,可是相当有特色。当然最有特色的是内涵非常深邃的佩饰,因为佩饰往往显示着各民族的图腾和风俗,这些种类及其区别在人类文化大百科全书中都很难尽数查到,我们能说他们的服装不够现代吗?如今挖掘传承都来不及,还能贬低这些民族服装的价值吗?

今天的世界主流更倾向于和平与发展,网络使人视阈更广阔,更容易看到其他民族的面貌,也更易于正确评估本民族的文化高度,中国青年人越发热爱自己的祖国,频频掀起国潮热,这是一个当代思维理念确定的典型。我们以新的眼光去平等地审视各国各民族服装,才发现世界服装本无高低。智能时代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而服装正是显现的文化载体。

放眼世界,服装本无高低

华梅

华说华服

读诗散札(二)

「罗袜」的真实

魏暑临

洁上丛话

谈起古诗文中的“袜”,最能引发美好遐思的,无如曹植《洛神赋》“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一般形容仙子行于水上,必想象其一尘不染,但这里轻盈的罗袜怎会生尘呢?有人说这是比喻,《文选》五臣注吕向曰:“步于水波之上,如尘生也。”但如此平凡通俗的喻体,似远不能与那清澈的水波或水波上晶莹缥缈的水雾相媲美。又有人说这是一种特异的真实,《文选》李善注:“言神人异也。”即洛神遵循神的原理,她走在水上本就能生尘。

废名先生《罗袜生尘》一文认为这恰体现了诗的真实性,并引李商隐《袜》诗中“好借嫦娥着,清秋踏月轮”之句,指出嫦娥脚踏着洛神袜的趣味,就是以“渡水欲生尘”这一意象的真实为基础的。

其实,即便说“生尘”是比喻,背后的原理也是指向生活的真实,本体玄幻而喻体常见,一下子让人从文学的奇思回到质朴的真实,说不定还要低头看一看自己脚上穿的袜子。这种真实,就是想把“飘忽若神”的仙子说得离我们很近。

嫦娥也是仙子,且就在月轮之上,何必必要脚踏洛神之袜才能踏月轮呢?还不是因为穿上这罗袜能如履平地,接近常人吗?于是,所谓“踏月轮”其实就是“踏月轮渡水前来相会”之意(参见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集解》)。

当然,“罗袜生尘”的妙处,还在于它虽然凌波却依然干燥,否则,尘就成了泥。带水拖泥,美感全无。这也是“神人异”的一个体现。

凡间的袜子当然是遇水而湿,李白《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说班婕妤深夜凝思,伫立良久,罗袜为潮气所湿,阴冷生于足底,痴情见于无言,可怜可叹。



扫二维码,观看本期节目视频。



天津孕育的戏剧大师曹禺

王云芳



曹禺的许多剧作都是以天津为中心孕育的,成名作《雷雨》虽是在清华读书时写就,但早在南开中学就读时他就开始酝酿、构思。《雷雨》中的繁漪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情感细腻丰富,而封建伦理对妻子、母亲身份所规定的贤良淑德的要求,与其极端的个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周朴园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代表,他曾经也有深爱的人,却最终屈服于封建伦理,抛弃了侍萍和孩子,变成了封建制度的继承者。他总说繁漪精神不正常,强迫她喝药,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个“阁楼上的疯女人”。在他的专制统治之下,呈现的是新一代生命的萎缩、扭曲乃至毁灭。从封建伦理观念来看,繁漪的行为为人所不齿,然而,她身上体现出的“非理性”的魔力让人动容,那是个体生命的绝望抗争。

剧中雷雨的意象非常具有象征性。表面上是剧本设定的自然环境——夏天那令人闷热的雷雨之前的天气,读来却总让人联想到那无处不在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似乎也隐隐期待着一场挟带着霹雳闪电的雷雨,能冲破桎梏、清洗掉一切罪恶。这意象的形成与曹禺的家庭环境有些关系。曹禺的家庭,生活无忧。父亲虽然对他很好,但脾气有些喜怒无常,动辄大发雷霆,家中经常“沉静得像座坟墓似的,非常可怕”。曹禺自幼失去生母,心性敏感,这压抑的氛围被移植在《雷雨》之中,成为曹禺忧郁气质的抒情性呈现。

曹禺的剧作一般不会详细地描摹社会背景,他更注重攫取整个时代精神的灵魂。近代天津与上海同样租界林立,所以曹禺的另一部名作《日出》常被误解为以上海为背景,其实却地道地取材于天津。为了收集创作素材,曹禺跑遍了天津城的每个角落。剧中交际花陈白露的活动场所是以豪华的惠中饭店为原型,那里既有各种社会上层人物出没,也隐藏着种种肮脏的交易。第三幕中下层妓女翠喜的生活场景,则是曹禺在“三不管”侯家后、富贵胡同等地方调查研究的真实写照。在《日出》中,他塑造了黑帮老大、富婆、银行职员、下层妓女、交际花和知识青年等各式人

●《小楼春秋》解说词:

曹禺旧居在那个年代出现是比较新颖的,它的建筑风格应该说还是比较朴实的,前后两个楼,中间有一个花架进行连接,比较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符号,虽然没有大屋顶,但是青砖砌筑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花饰等,更有中国传统韵味。(节选,有改动)